

【文学】

DOI: 10.15986/j.1008-7192.2017.03.012

象征主义与张承志的小说

黄思颖

(华侨大学 文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21)

摘要:西方象征主义思潮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它的产生是对传统现实主义乃至自然主义文学的一种反叛,并在西方文学史上产生了一定的余音。象征主义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并影响了中国的一批作家。新时期文学再一次向西方打开了大门,象征主义作为文学思潮又一次连同中国文学传统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张承志作为新时期的代表作家,作品中也受到象征主义思潮及其文学主张的引导。在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下,通过张承志的生命哲学思想、诗化小说的形式以及小说内容的深层意蕴来探索象征主义对其的影响。

关键词:象征主义;影响;生命意志;诗化小说;深层意蕴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7)03-0071-06

西方象征主义思潮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它的产生是对传统现实主义乃至自然主义文学的一种反叛,力图重新把握文学的特征,努力探求主客观之间的契合点。象征主义者们认为,在可感的客观世界深处,隐藏着一个更为真实的、永恒的世界,人们只有凭直觉才能领悟,而艺术地传达出这种秘密便是诗人的最高任务。作为“一种全新而独特的精神状态”^{[1]216},它要求着“艺术的权威、美、形式的力量、诗歌的效力在一群人的思想上从来没有如此迫切地要求成为一种内心生活的基本内容,这种内心生活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神秘主义’的。”^{[1]217}这种“内心的”、“神秘的”精神状态成为象征主义的基本特征。而象征主义的作品也多朦胧美、暗示和隐喻。作为一种反传统、非理性、表现自我的文学思潮,象征主义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对于传统文学审美观念的反驳。在世纪末情绪的渲染以及唯心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下,诗人们逃避回自己的内心世界,用通感和象征的手法诉说着苦闷和孤独。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恶之花》,在颓废与丑陋中昭示着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发展到20世纪后期,象征主义又以艾略特为代表的《荒原》,体现了特定时代下诗人们的文化反思。

象征主义传入中国,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作为一种异质的文学思潮,象征主义的传入为中国正在变革的文学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诉说内心的强烈愿望以及反叛社会的激烈表达,再加上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象”传统,中国作家们在选择与接受中找到了一条象征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合适路径。“象征主义的引入是一种综合性的渗透,从社会文化思潮着眼,象征主义是与世纪末(指19世纪末——作者注)的颓废主义和神秘主义一起传入的,从诗学角度上看,则是象征诗艺(即象征主义诗歌艺术——作者注)在思维方式和审美感受层面对中国作家的具体影响。在传播方式上,对象征主义的介绍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结合。”^{[2]60}于是,在最初的翻译介绍以及对于象征主义的文论分析过后,一批文学家在其作品中体现出了象征主义的渗透和影响。象征主义诗歌开始出现,小说也有涉及,鲁迅、老舍、茅盾的许多作品中都有典型的象征意象。

象征主义对于中国文学作品的影响,是一个不断开阔与创新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文学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又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各个流派的影响,象征主义也在这种继承与开拓中影响了中国的一批文学作品。而张承志

收稿日期:2017-01-09

基金项目:华侨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育计划项目(2015)

作者简介:黄思颖(1993-),女,华侨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及文艺学。E-mail:2389109621@qq.com

作为新时期的典型作家,从初入文坛开始,就以不平凡的声音显示了自己的独特性。向往“清静”、追求“信仰”、渴求“美文”的诗人气质,以及对于“宗教”近乎偏执的投入都让他的主观世界与笔下的客观世界激荡出不一样的火花。他对于生命意志的表达与执着理想的追求与象征主义回到自身主观世界关注自己的观点不谋而合,他的散文诗化般地表现方式也展现出了象征主义的色彩,同样,其小说中不断出现的意象更是象征主义影响的直接体现。本文通过对于张承志小说的分析和研究,探索其小说中受到的象征主义的影响。

一、生命意志与理想追求

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译介和发展,中国作家对于象征主义的借鉴已不单单只是技术层面,而是掺杂着文化与哲理的思索。

唯心主义作为象征主义的哲学基础,它的传播将象征主义从简单的“象征手法”的技巧性借鉴扩展了思想性的空间。在康德那里,图式的感性和象征的直观才能表示概念的实在性。同时,对于叔本华、尼采、帕格森等人的哲学体系的介绍也使得象征主义的传播更加全面。叔本华认为生命因有欲望而痛苦,而意志则是能够用充满象征色彩的形式作为达不到的欲望的替代物,从而实现理想。帕格森更是强调人的本质是生命之流的绵延,这是心理之流,是意识直流。总之,他们都不约而同强调起人的主观意念与感觉的作用,强调起个人的强力意志精神,而这也是象征主义的基础。“生命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构成了象征主义思潮的哲学底蕴。它使象征主义对中国的影响远不止于技巧层面,同时更触及了中国作家对生命现象和个体生存的哲理思考。”^{[2]108}正是因为鲁迅、王国维、冯志等人的努力,象征主义才在思想方面不断扩展着作家的思维,而不至于纯于技巧而消亡。

不同的时代划过同样的历史轨迹,由此而激发出思想上的共振。19世纪世纪末的颓废与孤独情绪,似乎与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欣欣向荣地发展状况格格不入。但是作为现代性的副产品,中国还在完成“未完成的现代性”的同时,就已经

体会到了迷茫消沉的“世纪病”,于是残雪、余华、格非纷纷用笔头诉说着孤苦。不同于他们的是,张承志并没有钻进文学的象牙塔,玩起晦涩难懂的文字游戏,而是扛起时代的重任,举起“英雄”的旗帜,“为人民”而书。

如果说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是在现实的此岸,在阴郁与颓废中,借都市花之恶,描写了西方社会的病态面貌,表现了现代社会的精神空乏,从而激励人们的斗争精神。那么张承志则是在理想的彼岸,塑造出精神理想的栖息地,并无限地去追求,耗尽生命的探索,因为生命意志是不可打败的。城市中有“黄泥小屋”;草原上有“金牧场”;山区里有“大坂”……这些理想圣洁的远方,全部化为一个个具体可感的实物,仿佛就在眼前,实则遥不可及,但永远不变的是坚持的精神与追求理想的信念。在无数风雪交加的日子,额吉只要想到远方美好的家园,就可以坚定前行;翻越无数座大山,甚至忘记在家待产的妻子,也要到达心中充满幻想的大坂……还有奔腾的黑龙江、美丽的夏台。在追求中,张承志将所有的力量都化为在路上的行走,“‘走’的形式最终被生命化和本体化,是肯定自我和反抗绝望的生命形式,成了生命自由的象征和对生命强度的印证。”^{[3]42}在这里,生命意志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只有相信自己的主观力量,才可战胜眼前的颓败,到达理想的目标。而正视自己的主观力量,正是象征主义生命哲学所要表达的。理想化作具体的实物,追求化作实际的行动,两组象征相交并进,完成生命意志的书写和理想追求的刻画。同样面对失落了价值信念的社会,波德莱尔在丑陋中看到了美的力量,并且也追寻着这样的力量,张承志则是在超越中发现了价值的永恒。不变的是二者都在象征中完善了自我的追求,谱写了生命意志的伟大。

此外,张承志对于印象派画家梵高的推崇不容小觑。他欣赏梵高画作的艺术,渴望在精神层面与其沟通,在他的众多散文中都可以看到张承志对于梵高作品的赏析。梵高将生命化为浓烈的色彩,在激情与碰撞中展现出来,深沉而浓郁的黑色,耀眼而夺目的黄色,跳跃而迸溅的红色,生机而活力的绿色……这一切在梵高的笔下都有

了生命的意义。而张承志精准地洞悉着色彩的意义，并用文字的形式与梵高进行时空对话。《向日葵》“是他色彩选择最彻底的一次。因为它以狂野的不协调造成了乱调，这种乱调之感纵使在今天也依然灼伤人目”^{[4]358-359}；而在《星空》中“所有的色彩都变得绝对自由了”^{[4]357}；面对火焰般的《阿尔景色》，他又感到“黑黑的蓝紫色幕后仅仅强调了一个冷峻的道理：对抗的全部力量都强悍地涌动着，但是对抗不在今天”^{[4]357-358}……于是，在他的小说中，也有着色彩的意象群，闪耀着青春活力的内蒙草原是绿色的交响；交织着酷烈激情的火焰山是红色的跳动；而当作者终于停止脚步，走向信仰的终极点，深沉静穆的黄土高原便是黄色的质朴与隐忍。

总之，张承志小说中展现出来的生命的耀动与理想的追寻，是与生命意志哲学分不开的，这是韧性战斗和反抗绝望的哲学，相信人的主观力量，用尽全力去战胜和追求。而象征主义作为生命哲学的表现形式，在作品中也有了很好的体现，用人的情感去代替客观对应物，去寻求“物”与“人”的应和，讲理想信念化为具体对象，“黄泥小屋”、“金牧场”作为理想的终点是因为象征才使其拥有了意义。印象派绘画作为美术的流派在某些方面与象征主义在艺术追求上具有相通性，而张承志从梵高那里的借鉴也体现了这种影响。在同样面对社会价值信念崩塌的主题下，张承志虽然在创作中有着象征主义的影子，却没有流于与其一样的苦闷和颓废，而是直接从哲学根基去群求支撑，将象征化为行动的力量，作品中展现的，是生命不止的冲动。

二、诗人气质与诗化小说

“诗化小说”可以说是象征主义运动产生的另一个传统，法国象征派诗人古尔蒙曾提出“小说是一首诗篇，不是诗歌的小说并不存在。”^{[5]37}J·弗里德曼也在《象征主义小说：从于斯曼到马尔罗》中指出：“新小说不像它的前辈们那样注重按顺序讲故事和从生到死单刀直入地刻画人物；它更愿意分解叙述，把经验切割成小块的事件，通过重复出现的意象和象征，而不是通过事件来把这些零碎的经验连接起来。”^{[6]423}从这个意义上

讲，在象征主义的影响下，小说也出现了颠覆性的转变。叙事不再是主要功能，而是借助象征、意象等形式，同时在小说中融入诗歌散文，让小说的抒情意味更加浓厚。自此，这种抒发主观情感的“诗化小说”便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它将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小说中充满诗意的氛围，在西方文学史上一直流传。发展到后来，则是以詹姆斯为代表的心理小说以及接着出现的意识流写作。

小说的这种转向传入中国，则是周作人、朱光潜等人的提倡。朱光潜反对给文学形式划分类别，周作人也提出了“抒情诗的小说”的概念。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这种“诗化小说”便也随着作家的创作实践诞生了。从废名走过的《桥》到沈从文住过的《边城》，从鲁迅到冯至，更有后来汪曾祺“纯小说”的探索，中国的诗化小说在理论和实践中逐渐完善。

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在经历了文革那样的宏大叙事之后终于走向多元化，于是这种充满诗意的小说形式便又一次回归人们的视线。而张承志的小说，更是将其诗人气质发挥到极致。如果说最开始写作《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的青年还在努力寻找小说的事件，力图从中构造出高潮和结局，那么到《黑骏马》时期，已经明显可以看出作家心态的改变。用古老的蒙古歌谣贯穿全文，主人公的一生则演绎了这平凡歌谣的伟大意蕴。只是这时，情感的抒发还是直接大胆，事件的贯穿也是清晰展现。到了作家创作的第二阶段，那远方高高挂起的《残月》，以及大漠深处的《九座宫殿》，还有那理想的《黄泥小屋》已经成了作品的终极意义。没有特别的情节和人物，作者已经将这些化为神圣的目标，可以说，他们的存在就是作品的目的。而后，面对商品经济的不断冲击，张承志再也不能静静地动情就好，他开始宣泄，开始呐喊，于是就有了我们看到的《胡涂乱抹》。“它基本排除了故事因素，通篇都是激昂的情绪宣泄。母亲，歌手，草原以及沙漠，这些都是作家宣泄内心淤积情感的象征符号。”^{[7]18}而接下来创作的《金牧场》更是恣意挥发，两条结构交叉并行，每一条结构中又穿插着回忆，打破行文逻辑和顺序，完全像写诗一样自由前进。

张承志看尽了文学创作的“不洁”模式,他想要寻找心中最纯净的净土,而小说带有虚构和故事的模式阻碍了他的发挥,所以将小说写得像诗,故事和人物并非主要,而在故事背后所渗透的哲思才是作者要表达的真正内容。“他所苦心经营的,只是试图以一种属于自己的小说叙述语言,通过特定的严峻生活的真实描写与精彩刻画表现出某种超出直接反映对象本身、又潜藏在其中的蕴告,这就是张承志小说诗的素质。”^[8]可以说,诗性的小说一直是张承志的追求,他曾经说过“文学的最高境界是诗,无论小说、散文、随笔、剧本,只要达到诗的境界就是上品。”^{[4]220}于是,我们可以在静谧的绿夜中看见作者跳动的脉搏,小奥云娜的变化是时间的必然,可是那绿夜深处,却“亮起了一颗星”,它是不是用来照亮那失落的心指引回家的路;我们还可以在沧桑的老桥旁无限地追寻和怀恋,这联系了过去和未来的老桥,才是故事的主角,唯有它才能证明过去的一切真实地存在过;我们也可以望着远方的大坂,超越时间和眼前的一切,克服延绵不断的苦难。这些意象构成了其小说的主要角色,荡漾着诗意,凝练着生活的纯粹。张承志的诗人气质也就在这些意象中得到发挥了。

可以说,他的小说是荡漾着激烈的感觉色彩的,与象征主义提倡的一脉相传。张承志不止一次地在散文中表示过钟爱“纯诗”这种形式,而他自己也创作出了《错开的花》《海骚》《黑山羊谣》等诗体小说,后来更是拒绝小说,专心散文这种创作模式。从意象的营造到感觉空间的叙写,从时空顺序的倒置到完全心理层面的挥洒,中国的诗化小说完成了它的发展和成熟。张承志的小说更是展现了这一流程。也许张承志的选择与时代气息以及自身特质分不开,但不能否认这一文学传统一路流传下来的影响,从西方传入中国,在中国又从20年代传承到新时期,每一个偶然的选择,都有背后必然的原因。

三、象征意蕴与深层空间

张承志的小说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可以窥见其受到的象征主义影响。在小说文本层面,他对于象征技巧的运用更是不能忽视。

象征主义作为一种“反叛”的文学思潮,在诞生之初就以不一样的主张获得了关注。莫雷亚斯在《象征主义宣言》中称:“自然景色,人类的行为所有具体的表象都不表现他们自身,这些富于感受力的表象是要体现它们与初发的思想之间的秘密的亲缘关系。”^{[9]46}也就是说,“象征”这种形式作为沟通的纽带联系了“表象”和“初发的思想”。从此,客观世界已经不仅仅是客观的实物,而是被作者赋予了意义的存在。查尔斯·查德威克论述了象征主义的两个方面:首先,“它表达思想和感情不是直接描绘它们,也不是通过具体意象明显的比较来解释它们,而是暗示这些思想和情感,通过运用那些未加解释的象征在读者心中重新创造它们”;其次,“还有第二方面的内容,有时被称作‘超验的象征主义’,它不是诗人心中具体思想和感情的象征,而是一个巨大而又普遍理想世界的象征。”^{[10]4}所以说,这里的象征与传统意义上的意象并不一样,它是读者完全陌生的意义联系,需要重新创造。此外,它也揭示了象征主义的神秘色彩,使象征主义作品除了可以在情感上引起共鸣以外,还可以使自己变成象征的一部分,创造并融入这个象征的世界。从这一方面说,象征主义不仅仅是主观与客观的对应,而是在象征的基础上产生阐发空间,因此小说文本在运用时也多了深层的意蕴。

仔细阅读张承志的小说,不难发现他因为象征技巧的运用而使作品带有的深层意蕴空间。“通感”作为象征主义的诗学主张之一,是对于人类感官与宇宙万物之间可沟通的一种信念。因此,对于波德莱尔等象征主义诗人来说,“通感”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象征主义的活动,物体则是“藏匿其后的一些理想形式的象征”。^{[10]10}在兰波那里,诗人更是成为“通灵者”,可以在表象中窥见宇宙神秘的奥秘。张承志作为小说界的“通灵者”,太阳、月亮、火焰、高山以及奔流的大河,都被他化作负载了理想与信念的意象群。作为一个永恒追求的理想主义作家,太阳那充满希望的光环在张承志那里一开始就有了不一样的风貌,太阳的东升西落成为了生命的循环往复,《凝固火焰》里太阳的炽烤居然也成了穿越火焰山人们的信仰,太阳与火焰已经凝结为火辣辣的一体,而当艰难

的考察终于结束，所有的一切也只能化作 kun（维吾尔语的“太阳”）在心中回绕；《黄泥小屋》中太阳的照耀也给昏暗的沉闷的生活带来了不一样的活力；而在《心灵史》中，破晓的光辉于是成为了安慰苦难的一剂良药……作为虔诚的伊斯兰信仰者，月亮在张承志那里固然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如果说太阳预示着希望，那么月亮就是无数漫长黑夜里陪伴的光源。《残月》中那轮清真寺上的铁月亮却救赎了杨三老汉饱受折磨的心灵，而在《亮雪》中，作者更是将月亮化为一批骏马（月亮古赫），陪伴主人公度过漆黑的，冻人的十月草原……此外，黑龙江、金牧场、黄泥小屋、大坂等作为意象群都以实际的物品替代了远方的目标，它们成为追求、目标的象征；而黑骏马，老桥以及湟水等“此岸的实物”则成为了见证人的象征，是奋斗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陪伴。此外，象征主义的暗示色彩，在张承志的小说中也有体现。《心灵史》作为一部融合了宗教、文学与历史为一体的小说，绝不仅仅是要写出一个民族的秘史，而是在七代导师奋斗史中，展示了哲合忍耶为了信仰和生存奋不顾身的世界，他们拥有的执拗的“清洁的精神”是现时代中不曾出现的。于是《心灵史》便在这个意义上获得了整体的象征性，借用历史的书写暗示了精神的赞颂，也昭示了张承志想要追求的那种“义、信、耻、殉”的清洁精神。

同时，更因为小说中“超验的象征”的存在，才能创造出空灵、神秘的氛围。张承志所要执着追求的那个理想世界，就是这种“超验的象征体”。不论是草原上的金牧场，还是黄土高原上的黄泥小屋，亦或是远方的西北高原，作者都在潜心创造这种理想的象征体。这时，作品已经被抽象化和寓言化，小说中的象征已经变成一种自觉的体悟和探索，它不再是作者意图赋予的意义，而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存在。而这样的象征诗艺，也为小说带来了多样的艺术生命力。正如叶芝所说的：“只有理性能决定读者应在哪儿进行琢磨，如果象征纯粹是情感上的，他便从世界上偶然和必然的实践中来观察；如果象征也是理智的，他自己就成为纯理性的一部分，同这一连串的象征融合在一起。”^{[11]58}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象征诗艺的影响下，小说文本被拓展了意蕴空间，在主题策略上达到了深层次的阐述。张承志小说中的意象群，不是传统中国古典诗歌中那种“约定俗成”的意象，而是凝聚了作者哲理的思索，有时甚至在整体上塑造象征的空间，扩大了小说的承载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张承志的小说受到的象征主义的诗学主张是不言而喻的。

四、结 语

象征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在中国文学变革之际传入并影响中国的作家作品有其必然性。张承志是一名理想主义作家，而象征主义正是通过象征来表现作家内心的理想世界。通过对张承志小说的思想、形式以及作品的内容等方面研究，不难发现他的作品中有意无意中透露的象征主义的主张，他的创作实践，也很好地展现了这些主张。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中，象征主义仍旧以其博大的影响力，支持和影响着中国作家的创作。

参 考 文 献

- [1] 瓦莱里. 文艺杂谈[M]. 段映红, 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 [2] 吴晓东. 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 [3] 黄发有. 诗性的燃烧——张承志论[M]. 南昌: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 [4] 张承志. 张承志文学作品选集·散文卷[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5.
- [5] 布吕奈尔, 等. 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史[M]. 郑克鲁, 等, 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1.
- [6] 布雷德伯里. 现代主义[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 [7] 李秀萍. 清洁之旗——论张承志的精神之旅[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
- [8] 宋坚. 张承志小说的生命意识和诗性素质[J]. 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2): 64-66.
- [9] 黄晋凯, 张秉真, 杨恒达. 象征主义: 意象派[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 [10] 柳扬. 花非花——象征主义诗学[M]. 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 1991.
- [11] 戴维·洛奇. 二十世纪文学评论[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A Research of Symbolism and Zhang Chengzhi's Novels

HUANG Si-y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21, China)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western symbolism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rebellion against traditional realism and even naturalistic literature, has produced some lingering voices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literatu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the symbolism inspired a number of Chinese writers. In the new era Chinese literature once again opens the door to the West, and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writers i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literary trend of symbolism as well as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 Zhang Chengzhi, a representative writer in the new period, is guided by the trend of symbolism and its view of literature in his literature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search,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the symbolism on Zhang Chengzhi in the aspects of his life philosophy, the poetic novel form and the deep meaning of his novels.

Key words: symbolism; influence; life will; poetic novel; deep meaning

【编辑 吴晓利】

(上接第48页)

[13] 罗伯特·C·埃里克森. 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M]. 苏力,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14] 沃尔夫冈. 现代化与社会转型[M]. 北京: 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2000.

[15] 徐选国, 徐永祥.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三社联动”: 内涵、机制及其实践逻辑——基于深圳市H社区的探索[J]. 社会科学, 2016(7): 88-89.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Rural Substrate Society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LI Qin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China, the Chinese rural society has undergone four restructuriions in its production relations, in which the reform of rural economic system has changed the status of the rural social organization. Once based on the consanguinity and the geographical relation of clan organization, the traditional rural society, disintegrated eventually, and the “top-down” type of organizations also varied gradually even if dominated by the state intervention. Especially after the reform of taxes and fees, more and more rural social members dissociate themselves from the organization. In order to tackle the dilemma that the rural society is to be “atomized” and the issues that the mobilization of the rural substrate society is inadequate to govern the public affairs, we are expected to reconstruct the rural social organizations inevitably.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is aimed to get the rural individuals back into the organization and to achieve a better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grassroot society in the rural substrate society governance.

Key words: production relations restructuring; atomization; substrate society governance; social organization; reconstruction

【编辑 吴晓利】